

二、它的含義是明晰確定的，不容易混充。假如一個政府宣布它保障言論自由，但是在它所有的報刊雜誌市集會議電視廣播中，都見不到公開的重大不同的意見和反對意見，那麼它顯然是在撒謊。

三、它對於極權統治是一種致命的攻擊。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由於浸過神水而全身上下刀槍不入，唯有其腳後跟由於不曾浸泡過而承受不住攻擊。極權統治的致命處就在於不能公開否認言論自由原則而暴露出自己極為虛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對人們思想言論的嚴密控制，極權統治就喪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四、即便是那班處心積慮的極權者也無法公開拒絕言論自由的原則。這就使得他們在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上不得不處於劣勢、處於守勢，而且必然會節節敗退。

五、言論自由原則對最大多數人具有最大的說服力。它不像其它一些往往是更激烈的主張，很容易引起一些人不無道理的疑慮，特別是關於必要的社會安定的擔憂。沒有人會相信有了言論自由社會便會陷於混亂的無稽之談。

六、明確地、公開地堅持言論自由原則，並不需要過人的勇氣，這就能讓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來謹慎小心的人們也參與到抵制強權的正義鬥爭中，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而又溫和的壓力，有力地推動我們的社會向着真正的自由邁進。

群衆與文化大革命

——研究文革的一個新角度

王紹光

如果歷史真能給人以教訓，作為中國人，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最值得研究的歷史事件之一。可悲的是，正如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一樣，在研究文革方面，也是洋人走到了前頭。過去廿年裏，西方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新聞記者及外交官，已寫出了幾十上百種關於文革的著作。他們都試圖以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解釋文革的意義及其產生的原因。應該承認，他們的努力大大增進了世人對文革的了解。但是在他們的研究中，文革最重要的一個方面被忽視了，那就是億萬普通老百姓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文革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億萬羣衆的捲入。去掉這個特徵，文革就不成其文革。同理，忽略了這個層面，就很難稱其為完整的文革研究。

當時，毛澤東對文革評價的再評價。毛澤東說：「文革是中國的一場大革命，是中國的一場大浩劫。」

鄧小平說：「文革是一場大浩劫，是一場大災難，是一場大倒退，是一場大錯誤。」

中國大陸對文革的反思

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提起文革，人人持否定態度；說到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多人更是有

吐不完的苦水。冤有頭，債有主，誰是造成這場民族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呢？林彪、四人幫固然是罪責難逃，毛澤東本人也難脫干係，於是聲討之聲不絕於耳。但是人們似乎忘了，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上發高一呼，是誰在那兒歡呼跳躍，表示衷心擁護？揪黑幫、掃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生活方式、舊風俗習慣）、鬥走資派、奪權、武鬥、清隊（清理階級隊伍）、抓「五一六」。又是誰在其中上竄下跳、大打出手？自稱文革犧牲品的人有多少人會扪心自問，是否也會迫害過別人？痛斥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為人民公敵的人，是否想過為什麼當年把他們的指示奉若神明？我們當然並不想為毛澤東、林彪、「四人幫」開脫罪責，問題在於十年文革絕不僅僅是在中南海開場、收鑊的宮廷戲。找出幾具僵屍來鞭答一番固然能使人心大快，但這樣做能使我們對文革的認識增加幾分，值得懷疑。如果想使認識深入一步，我們必需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七億中國人在那個時代瘋狂地投身於那個瘋狂的運動？

為什麼所有人都自稱忠於毛澤東，卻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派別，撕殺不已？

中共並不比普通老百姓更願觸動舊目的傷疤。一九八一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文革定義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被認為應對「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同時，中國大陸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被認為是使文革難於防止和制止的重要前提條件。至於羣衆的作用，《決議》只有短短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羣衆，實際上，脫離了廣大羣衆。」人們也許會問：如果文革脫離了羣衆，誰構成了這個翻天覆地的運動的社會基礎？

有意思的是，大陸研究文革的學者對羣衆的作用也諱莫如深。例如高卓、嚴家其夫婦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分為三篇。第一篇談毛澤東，第二篇談林彪，第三篇談江青。這種結構本身就不可能留給羣衆什麼注意力。其他的書，如《歷史在這裏沉思》、《肅清染葉東紅——陳毅在文革中》、《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紀實》，以及發展在《黨史研究》和《黨史研究通訊》上的專論文章，基本上也沒有觸及羣衆的作用。但是，億萬人民捲入了文革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地方，文革中形成的派性依然以各種形式頑強地存在着，影響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一九八四年七月，中共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反派性教育，並為此編寫和散發了許多宣傳性的小冊子。這個宣傳的一個目的是試圖讓

人們相信，文革不是一場「真正的」羣衆運動。什麼是「真正的」羣衆運動呢？據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任何一場真正的羣衆運動，都不是少數幾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①因為文革不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所以文革不是「真正的」羣衆運動，雖然億萬人民會積極地參與其中。這種解釋本身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呢？一查說這話的恩格斯的原著，西洋鏡就戳穿了。^②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中，恩格斯的原意是：任何運動只要捲入了大量的羣衆，它就不可能只是少數幾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應被理解為「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③爲了證明文革不是羣衆運動，而拿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當普羅克拉斯提斯魔床（The Procrustean bed），這種作法實在不高明。

普魯士三家村^④的唯一倖存者——麥沫沙——對文革的理解深刻得多。^⑤他引用列寧的話，批評一般人對文革的解釋跟老式的歷史理論一樣有兩個主要缺點：第一、至多只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第二、沒有說明人民羣衆的活動。接着他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兩段話。

①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見 *Karl Marx Selected Work* 卷二，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紐約，一九三九年，第四十一至四十二頁。

② 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以批判「三家村」（吳晗、鄧拓、麥沫沙）開始，發動了文革。

馬克思在總結一八五一年法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指出：

法國當時的革命爲什麼失敗呢？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到了偷襲，那是不夠的。民族和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並沒有揭穿謎底，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麼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無抵抗地作了俘虜呢？^⑥

恩格斯在研究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德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時，說說類似的話：

這些原因不應該從幾個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動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震動的國家的總體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⑦但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爲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解釋半點東西，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別人出賣自己。而且，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悲了。

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永遠不會相信，十二個人能在三個月之內毀壞一個有

③ 同註①，第三百二十一頁。

三千六百萬人口的民族，除非這三千六百萬人辨認方向的能力和這十一個人同樣缺乏。④

• 72 •

通過引用這些段落，廖沫沙試圖提醒人們許多有關文革的重要方面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例如，為什麼少數上層領導人可以將偌大的中國引入內亂達十年之久？為什麼老百姓要分裂成敵對的派系，並互相殘殺？羣衆捲入文革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他認為，不回答這些問題就無法真正從文章中吸取教訓。

當然，在一定意義上，大陸政府和學者避免談及文革的羣衆基礎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個問題太敏感，搞得不好就可能將好不容易才平熄下去的派性意識重新煽動起來，並引起社會動盪。為了維護目前的「安定團結」，這些問題最好留給後人去談。這也是大陸政府不斷鼓勵人們「向前看」的原因。

西方對文革的種種解釋

如果說大陸政府、學者和一般老百姓是出於政治考慮才有意不去觸及文革的羣衆基礎，那麼西方學者同樣沒有觸及這個問題又作何解釋呢？

④ 同註①。

舊時的歷史學家在解釋複雜的政治事件時，常常津津樂道的是大人物的「心理怪癖」、「與生俱來的本性」或「堅定不移的意志力」。現在，社會科學家一般都拋棄了偉人史觀。歷史現象不再被認為是個別偉大人物活動的結果，而被看作是社會、政治、經濟諸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偉人本身就要受制於這些條件。但是一般地承認舊式理論的侷限性是一回事，運用新理論來解釋歷史現象是另一回事。至少在文革研究的領域中，偉人史觀依旣陰魂不散，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政壇關鍵人物的宦海沉浮，他們之間如何勾心鬥角及進行權力鬥爭上，尤其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更成為經年不衰的熱門話題。

有些學者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改造億萬中國人心靈的偉大嘗試。毛的目的是根絕個人主義，並為實現世界大同而塑造一種無私無欲的新新人類。另一些學者認為，權力之爭才是文革的真諦。但權力之爭論者內部又分成好幾派，有些人斷言文革的根源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交

⑤ 見 Daubier Jea,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4; John Gittrings, "What Was It All Abou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 20, 1969; Theodore Hsi-en Chen, "A Nation in Agon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Nov. -Dec. 1966; William Hinton,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Leo Huberman & Paul Sweez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Vol. 18 No. 8 Jan., 1967.

• 73 •

惡，或者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之間為爭奪最高權力而展開的殊死搏鬥。因此，他們把文革稱之為「毛澤東的大清洗」。有人走得更遠，說文革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清洗，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種恐怖氣氛，使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認識到任何對毛澤東的挑戰和不忠，都是不能容忍的⑥。大多數權力鬥爭論者不願這麼極端。他們傾向於相信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產生於為什麼是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方向，以及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看法不同。只是後來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的因素糾纏得太緊才使權力鬥爭的成份顯得更為突出⑦。

⑥ 見 Harry Gelmon, "Mao and Permanent Purge", *Problem of Communism*, Vol. XV, No. 6, Nov-Dec., 1966; Peter Ching, "The Reat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eud Between Mao and Liu", *Ovdis*, Vol. XI, No. 4, Winter, 1968; Chu-yuan Cheng, "The power Struggle in Red China", *Asian Survey*, Vol. VI, No. 9, Sept., 1966.

⑦ 見 Rodev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solution*, Vol. I and II; Peter Ching: "Liu Shao-Chi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XI, No. 10, Oct., 1971;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Bantan Books Inc, 1972; Gene T Hsiao,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VII, No. 6, June, 1967;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China Briefing* 1968; C. K. Ya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visionism", in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8; Philip Bridgman, "Factionalis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另一些學者把文革放到國際大環境中來考察，認為中國六十年代中期發生的變化實際上是外部壓力的結果。說得具體一點，他們相信，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他害怕美國在越南的捲入會危及中國革命。他想通過發動一場運動來激發人們的危機感和民族主義精神，最後消滅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⑧。

心理學家不甘寂寞，也試圖從他們的事業角度來解釋文革。有些人搬出了時髦的「認知不和諧」理論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說毛澤東之所以突發奇想來這麼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是因為他的期待與中國現實之間的距離太大。為了滿足主觀上縮小這種距離的願望，結果走上了這麼一條極端的道路。另一些人則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人有一種追求永恆存在的「需要」。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領袖，懼怕他所領導的革命夭折，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很難不朽。文革就是他為使革命永存所作的最後努力⑨。

⑧ 見 Ross Terrill, "The Siege Mentality" *The Problem of Communism*, Vol. XV, No. 2, March-April 1967; Michel Oksenberg, "Political Changes and Their Causes in China, 1949-1972",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5, No. 1, Jan-Mar, 1974; Leo Huberman and Paul Sweez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Vol. 18, No. 8, Jan, 1967.

⑨ 見 Paul, L. Hiniken, *Revolutionary Ideology Chinese Reality*,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77;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Vintage Books, N.Y., 1968.

「毛澤東中心論」背後的基本假設

任何人在解釋歷史或政治現象時，都很难面面俱到。首先，他看問題總有一個特定的角度。誰不願作「全景式」的研究呢？問題是很少有人能做到。其次，從特定的角度出發，在選擇研究材料時，總會有所取捨，研究文革也不例外。把注意力投向文革的那個方面以及如何進行解釋，都會反映研究者對文革總體的看法。上文提到的各種對文革的解釋在很多方面有相當大的差異，但仔細一想就會發現，它們都可稱為「以毛澤東為中心」的研究。它們至多只能說明為什麼毛澤東要發起文革，卻不能說明文革中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毛澤東中心論」者似乎沒有認識到，一個億萬人捲入的運動不可能完全被它的發動者所控制。由於他們都相信只要摸透了發動者的動機，文革之謎就可迎刃而解，可以推測他們心中或隱或現有下面三個假設：

第一、發動者不僅清楚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有能力設計出實現最後目標的詳細步驟。不然的話，僅僅憑着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這就難免不出現偏向，甚至南轔北轍。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研究這個運動，而這就常常偏離發動者的本來願望。很明顯，僅僅注意發動者的動機就十分不夠了。

第二、既使發動者有一套詳盡的計劃，還必須假設他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保證這套計劃

能在執行過程中不走樣。作為最高領導人，發動者必須依賴正式或非正式機構來幫他實現他的目標。過去二十年裏，政治學者已經認識到政策的執行過程至少與決策過程一樣重要，因為政策的執行者完全可能在執行過程中改變原訂政策的涵義。一個有關具體問題的政策尚且如此，遑論一場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絕大多數羣衆能理解運動發動者的意圖和實現這些意圖的計劃步驟，並切實地、不折不扣地執行發動者的每一項指示。換句話說，領袖與羣衆之間的關係應是一種單向通訊關係 (one-way communication process)，羣衆只是被動地接受領袖的指示，並一絲不苟地執行這些指示。如果單向通訊關係只是一種神話，領袖與羣衆實際上互相影響，則後者的作用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三個假設中，最後一個最為關鍵，因為運動的發動者能否拿出實現既定目標的詳盡計劃，能否控制計劃的執行過程，均有賴於領袖與羣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性質。如果領導人可以隨心所欲地玩弄羣衆於股掌之間，他當然可以輕而易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的子民。但是，如果羣衆並不如想像的那麼被動，則領導人充其量也只是整個舞臺上的一個角色，不管他能有多大的影響，也不應獨領風騷，吸引所有注意力。

五種分析「領袖—羣衆」關係的模式

如上所述，大陸政府、大陸學者和西方學者都傾向於以毛澤東為中心來展開他們對文革的研究，而基本上忽略了羣衆在這場運動中所起的作用。這表明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羣衆看成了被動的、受毛澤東支配的工具。

成億的人民怎麼可能變為一個領袖人物的工具呢？有五種相關的理論模式。

(一) 羣衆社會模式 (The Mass Society Model)

按照威廉·科恩霍色 (William Kornhauser) 的定義，羣衆社會是這樣一種社會，其中的精英份子可以很容易就將民衆動員起來，為其特定的目標服務^⑩。羣衆社會理論認為，一般說來，如果一個社會的中介團體 (Intermediate groups) 發達，人們積極參與家庭、職業、嗜好、社區、教堂、工會及其他社會團體的活動，則他們的興趣相對來說總是很具體的，遇到什麼重大問題大家也不至於走極端。相反地，如果一個社會的中介團體薄弱，人與人之間缺少溝通的渠道，則其民衆就會變為所謂「孤立化的羣衆」 (the atomized masses)。一旦失去了與他人溝通的中介層，隨之失去的可能是其個人利益。因此，人們趨向於追求模糊的、遙遠的目標，遇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他們總希望採取直接行動來解決，而且，稍遇抵抗，他們就會訴諸強迫和暴力手段。這就為極端的、反民主的社會運動提供了羣衆基礎。

在有些學者看來，文革表明毛澤東希望通過發動一場羣衆運動來建立一個「羣衆社會」。他們注意到，文革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權威統統被打垮了，只剩下了兩極：最高領袖毛澤東和億萬瘋狂的羣衆。前者是一切權威和政策的源泉，而後者只是毛澤東用來打擊他的敵人的武器^⑪。羣衆捲入這個運動並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讓毛澤東龍心大悅。

(二) 極權國家模式 (The Totalitarian State Model)

這個模式的奠基人埃米爾·里德爾弗 (Emil Lederev) 認為，羣衆社會是極權主義運動的基礎^⑫。但是，羣衆社會畢竟與集權社會有所不同。在取得政權以前，運用宣傳鼓動的方式製造羣衆運動的確是極權主義政黨的拿手好戲。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權，集體主義國家就會實行鐵腕政治。獨立的社會集團很難逃脫厄運，代之而起的是官方一手操縱的御用組織。政府的觸角逐漸伸向社會的每一方面，人人都被置於嚴密的控制之下。

當極權體制發展到頂點，就會出現個人獨裁。獨裁者將所有的權力集於一身，其絕對地

⑩ 見 Byung-Joon An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8, April-June, 1974, pp 249-285.

⑪ 見 Emil Lederev, *The State of the Masses, The Threat of the Class-less Society*, Norton, 1940.

位不容任何懷疑和挑戰。同時，恐怖籠罩了整個社會，一切對極權政治現實和潛在的威脅都會被毫不留情地加以清除，所有人都戰戰兢兢、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一個「幾乎完全由極權政府控制」的社會^⑯。

在不少人眼中，中國大陸政府早就被認為是一個極權政權，因此在研究文革時，極權國家模式論者自然把這十年發生的事情稱之為「一場大規模的清洗運動」。

億萬捲入文革的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幹部，在這些人看來只是受毛澤東操縱的玩偶，對文革的進程毫無影響。既然如此，研究小人物當然就是一樁徒勞無功的事了。

二 權威人格樣式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Model)

為什麼很多人會盲目追隨一個領袖以至於完全喪失了自立性呢？為了尋求答案，有些人找到了人格那兒。

弗洛依德在他的開創性著作《羣體心理與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裏首次提出了關於「領袖——羣衆」關係的心理理論。他認為，羣衆之所以追隨領袖，是因為在他們内心深處，自我(ego)與自我理想(ego-ideal)，也就是超我的目標系統(the goal system of the superego)之間存在着距離，並因此引起了種種

^⑯ Carl Friedv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Praeger, 1956, P. 10.

矛盾。在這裏，所謂內心距離(intrapsychic distance)指的是自我所能做到的與自我理想所要達到的之間的差距。

當內心距離變得很小時，自我就會尋找減少由此產生的痛苦的途徑，例如使用以下心理防衛方法：認同(identification)、投射(projection)、昇華(sublimation)、抑制(repression)等。在這些方法中，認同有助於形成「領袖——羣衆」關係。

在使用認同方法時，自我轉向一個外在物作為自我理想的替代，來縮小內心距離和恢復人格平衡。在「領袖——羣衆」關係中，領袖就是這樣一種替代物。弗洛依德注意到，一旦自我轉向外在替代物，「自我理想就不再發揮作用，自我的批評能力也會失殆盡。替代物所要求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被認為是合情合理、不容指摘的。為替代物賣力幾乎成了天經地義。有了這種盲目的愛，幹起犯罪的勾當也不會臉紅心跳。」^⑰

弗洛姆(Erich Fromm)後來將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提出了權威人格這個概念。按照弗洛姆的說法，權威人格一方面渴望將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一方面希望服從於強大的外部權威。因此，可以說權威人格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對於權力的懾

^⑰ 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Bantam Books, N.Y., 1960.

度。具有權威人格的人崇尚的不祇是對他有特別意義的權力，而是一切權力。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想克服無法擺脫的無權感（用弗洛依德的話，叫作縮小心距離）。這樣做可以使他覺得，他是在為一種高於自身的東西服務，從而充實他自己（這就是弗洛依德所說的將自我轉向一個外在物作為自我理想的替代）。

因為在「領袖—羣衆」關係上，羣衆的人格被認為是服從性的，由此可以推論，羣衆是一羣羔羊，他們可能跟着任何牧羊人走。羣衆捲入一個運動並不是因為這個運動對他們有什麼特殊的意義，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需要人引導而已。而且，不管需要他們作出多大犧牲，他們的服從性人格絕不會導致他們做出違抗領袖意志的事來。

有些學者就是用權威人格模式來解釋為什麼億萬中國人瘋狂地投身於文革之中。據稱，他們發現，在文革參與者的行爲中可以找到西方學者列舉的權威人格的每一特徵，所以文革參與者對毛澤東的盲從一點也不使他們感到驚奇^⑯。

• 超凡領袖模式 (The Charismatic Leadership Model)

在西方研究社會運動和集體行爲的理論中，常常提到某些領袖人物的超凡品質。據說，

⑯ 見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Red Guard Generation*,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具有這類品質的領袖可以輕而易舉地贏得人們的信賴和忠誠。韋伯 (Max Weber) 最早將「超凡魅力」(charisma) 這個概念引進了對於權威形成理論的研究。他認為，太平世界變化萬端，但談到權威類型，不外以下三種：傳統型權威 (traditional rule)、超凡領袖型權威 (charismatic rule)、「理性—法治型」權威 (rational-legal rule)。按照韋伯的說法，如果某人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同尋常的能力時，他就可以說具有「超凡魅力」。值得注意的是，韋伯沒有說該人真的具備神奇的力量，而只是說，他被人認為如此。有些學者讀書不小心，錯把「超凡魅力」當作一種特殊的人格，並相信世上確有少數人在娘胎裏就造就了這種能力。於是，他們千方百計、費盡心機去分析到底什麼是構成「超凡魅力」的要素。由於古往今來領袖人物千差萬別，他們列舉的「要素」多得不可勝數，從而完全沒有理論價值。現在，一般學者都認識到，「超凡魅力」並不在於一個領袖人物本身的品質，而在於世人如何看待他^⑰。

由韋伯的「超凡魅力」理論可以導出一種特殊的「領袖—羣衆」關係：「超凡關係」(charismatic relationship)。在這種關係裏，領袖可以駕馭四海、雄視八荒，享有至高

⑰ 見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Y., 1949, P. 359.

無上的權力；羣衆則必須駭駭兢兢、誠惶誠恐、唯命是從。換句話說，一旦某人被羣衆擁戴為「超凡領袖」，該領袖就成為了芸芸衆生的主人，可以隨意支配他們，而不須再顧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超凡魅力」理論裏，羣衆的行為是非理性的，領袖永遠是正確的。他指鹿為馬，羣衆就會一致認為鹿就是馬。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也不至於使羣衆出現信心危機^⑯。

毛澤東就被認為是這樣一種「超凡領袖」。超凡領袖型權威崇拜人治，毛澤東就自稱「無法無天」，打破了切現有的體制來造就個人統治。超凡領袖一般受到大眾的盲目崇拜，毛澤東就被人比作「太陽」、「大救星」、「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的話被說成是「一句頂一萬句」。每當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發表，舉國上下總是一片歡騰。人們的一言一行都被要求「符合毛澤東思想」。而且，每個人都表示，「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怕上刀山、下火海，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很多學者看來，既然文革中毛澤東與羣衆之間是一種「超凡關係」，渾渾噩噩的芸芸衆生當然就沒有什麼研究價值。

^⑯ 見 Ann Ruth Willner,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A Theor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8, pp 4-6; James V. Downton, Jr., *Rebel Leadership: Commitment and Charisma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Free Press, N.Y., 1973, pp 209-210.

四 中國模式

無論是大陸政府還是大陸學者都沒有提出一種可以稱「理論」的東西來解釋為什麼億萬人民會積極投身於文革。但是，有一種解釋十分流行，即「受蒙蔽論」。「受蒙蔽」一詞在文革期間已用得很廣泛。每一派都指責自己的對立面受了某些明顯的敵人的「蒙蔽」。例如，一九六七年初，那些提出「經濟主義」要求的人被斥為受了走資派的「蒙蔽」。一九六七年春，當造反派在各省受壓制時，他們被斥為受了牛鬼蛇神的「蒙蔽」。一九六七年夏，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保字派開始倒霉，他們被斥為受了「軍內走資派」的「蒙蔽」^⑰。甚至毛澤東本人也認為，羣衆之所以分裂成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派系，是因為走資派「蒙蔽」了他們。當時，一個流行的口號是：「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看來這個口號至今仍有效用。只要一個人痛恨林彪、四人幫，並承認受了「蒙蔽」，對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就不必負什麼責任了。

什麼使這麼多人受了「蒙蔽」呢？據一份廣為散發的官方小冊說，有四個因素：第一、個人崇拜導致了對毛澤東的盲信。億萬人民之所以毫不猶豫地投身於文革，是因為毛澤東親自發動了這場運動，而毛澤東本人被認為是不會犯錯誤的。第二、極左思潮誤導了羣衆。許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相信「中國已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邊緣」，因此決心緊跟毛澤東；一

^⑰ 武漢七二〇事件即武漢的保守派（包括軍隊中的）對造反派（包括毛派來的）反擊。

揮衛紅色江山」。第二、文革的狂熱氣氛迫使每個人表明態度，不捲入就會被認為在政治運動中不積極——這在當時是一項嚴重的錯誤。第四、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混水摸魚，欺騙了很多人^⑨。這份小冊子的結論是：廣大羣衆參與這場運動不是出於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判斷，而是受了以上四個因素的影響。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受蒙蔽論」實際上與頭四個模式一樣，把文革的參與者看作非理性的毛澤東追隨者。

儘管以上五個模式在細節上有很大的差別，它們都導向了一個結論：埃里克·霍夫（Eric Hoffer）所說的「真誠的信徒」（true believers）是可能存在的。依霍夫的說法，「真誠的信號」的特徵是：缺少個人利益、行為不是基於理性、對領袖喪失了批評態度、盲目服從領袖的每一項指示。

問題在於，運用這五個模式解釋文革的人基本上都沒有研究過羣衆在文革中的行為。稱文革的參與者為「真誠的信徒」只是一項未曾驗證的假設，卻被用來為不研究羣衆行為辯護。這種態度無論如何都不能認為是認真的。

事實上，文革的參與者並不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樣，是毛澤東純粹的、真誠的信徒。即使

^⑨ 金春明，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書，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七十四頁至七十五頁。

很多參與者本人自稱或自信當年完全是盲目的，分析他們的行為卻可以揭示，個人利益和理性成分在那個看似瘋狂的年代裏，自始至終發揮着作用。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不打算在這裏提出正面的證明。但願下面的反證能有一點啟發意義。

文革——難以駕御的羣衆運動

從邏輯上講，如果大陸人民只是毛澤東排斥異己的得心應手的工具，則他們應該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貫徹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齊心合力地打擊毛澤東的頭號敵人，直至最後勝利。文革也應該是一個受控的運動。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文革是一個難以控制的運動

衆所周知，派性是文革全過程中從未治愈的痼疾。文革初期，由於毛澤東的鼓勵，千萬萬個羣衆組織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一開始，這些組織在一個個工作單位內部形成並分裂。繼而，每派都到外單位尋找同盟軍，組成跨單位、跨行業組織。這些大組織互相磨擦、鬥爭、分析化合，最後在省市一級形成幾大派。一般說來，最引人注目的是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例如，全國著名的保守組織有：上海的赤衛隊、北京的捍聯總、黑龍江的

八八團、湖南的高司、重慶的赤衛軍、成都的產業軍、廣西的聯指、河南的十大總部、廣州的總派、武漢的百萬雄師。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後，各省的保守派相繼瓦解，但派性並沒有因此而減弱。剛剛抬頭的造反派內部馬上分裂了，形成了新的派性鬥爭。上海的保守組織垮臺最早，但上海市民都會記得三個日子：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因為在奪權中覺得分職不均，學生造反組織紅革會與工人造反組織工造總司發生衝突，並提出要「炮打」工造總司的「黑後臺」張春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工造總司組織上萬人武裝圍剿另一工人組織——上柴聯司。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原紅革會人馬再次揭竿而起，要把張春橋和他支持的組織搞垮。上海在文革中是毛澤東的樣版城市，直接接受中央控制，此處這麼難控制，別的地方就更不用提了。北京的造反派有天派、地派兩大派。兩大派之內又派系林立，如著名的新北大公社和清華井崗山在外人看來同是天派之首，但實際上，這兩個組織之間衝突不已，都想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在中原名城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剛剛翻身的造反派很快分裂成「鋼」「新」兩大派。他們之間的衝突常常比以前他們與保守派的衝突還要激烈。造反派內部的廝殺絕不限於上海、北京、武漢三個地方。事實上，這種現象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如雲南的八派與炮派；湖南的工聯與湘江風雷；黑龍江的炮轟派與反炮轟派；安徽的好派與混亂派；重慶的八一五派與反到底派；成都的八二六派與紅成派；浙江的大職總派與紅暴派；山西的紅聯派與紅總派。

泛濫成災的派性鬥爭使毛澤東頭痛不已。一九六七年七月，七二〇事件以前，他在武漢看到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使他大惑不解：為什麼同是工人卻成了仇敵呢？唯一他能想到的原因是，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蒙蔽」了這些羣衆。一個月後，他在杭州觀看了記錄上海工造總司攻打上柴聯司的紀錄片。據說，他看後沉默良久，然後自言自語地說：「該結束了，該結束了。」但是開啓蘊藏著潛在社會矛盾的魔瓶易，把釋放出來的派性惡魔收回瓶中難。從一九六七年夏起，抑制派性一直是毛澤東最感棘手的問題。從一九六七年秋到一九六八年春，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反派性高潮。從北京到各省，報紙、雜誌、廣播充斥着反派性的文章。從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三月，單上海人文匯報就發表了十六篇專門批判派性的社論，一般文章不計其數。這個反派性高潮雖然表面上很熱鬧，卻沒有什麼實際效果。到一九六八年夏季，整個國家又滑到了內戰的邊緣。從北京的大學校園到山西農村小鎮，從廣西邊疆地區到重慶的市中心，到處是炮火硝烟，斷垣殘壁。更危險的是，一些組織把中央不許成立全國性組織的警告當耳邊風，開始秘密籌建跨省的派系聯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別無選擇，只得急急忙忙把「工人宣傳隊」派進學校，並勒令解散一切羣衆組織。不久，幾百萬「革命小將」又被遣送到農村。在這種高壓政策下，公開的派性衝突基本上被制止了，但潛在的派性依然存在，而且一遇機會還會爆發出來。例如在武漢，大規模的派性衝突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一九七五年三

月期間，以及一九七六年都會重新爆發。

文革：一個總是偏離其發動者指示的方向的運動

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大概可以說，不是毛澤東掌握着文革的進程，恰恰相反，正是難以控制的文革推着毛澤東團團轉。

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那一天，未經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商量，在上海的毛澤東突然下令廣播北大虯元粹的大字報。那時，他對自己到底要幹什麼至多只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想法，至於什麼是達到目的的最佳形式，也許根本沒有一個計劃。這樣，當劉少奇、鄧小平在北京碰到麻煩，決定派出工作組時，毛並沒有表示反對意見。六月九日，在杭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毛建議工作組可以少派或不派，要派也應只派往特別需要的單位和地方。但別的領導人沒有把他的意見真當回事。因為一方面他並沒完全否認派遣工作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都覺得工作組有助於收拾第一張大字報引起的混亂局面。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到達武漢。同一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起草了一份題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我們的建議」的報告，強調工作組的作用，及在羣衆中「抓右派」的重要性。七月三日，王任重又寫出了另一份報告——「關於如何在大中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建議」。在這個報告中，王任重提出了「槍打出頭鳥」的著名口號，並號召各

級黨組織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進攻。這兩份報告都被當時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轉批到全國各省市，作為開展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他們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在武漢，他們相信毛澤東對這兩份報告是首肯的。據王任重說，直到七月十八日離開武漢返回北京，毛澤東還沒決定怎樣把剛剛開始的運動進行下去。後來，毛批判劉、鄧在從六月初到七月中的五十多天裏，把運動導入了錯誤的方向，下層的各級領導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毛本人不陰不陽的態度至少應為他們的「錯誤」負一部分責任。

毛澤東對文革要持續多久心中也沒有數。在六月初的杭州會議上，原本預定整個運動為期三個月。到七月底，兩個月過去了，但毛發現文革實際上還完全沒有發動起來。七月二十九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大中學校將停課半年搞文革。這意味着，毛已決定把運動延長三個月。此後，直到十月初，周恩來等人反覆強調，學校應在六甲七年春節後復課。但是，在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了新的時間表。他指示，如果必要的話，運動還可以延長幾個月，一共搞它十個月。一九六六年的最後兩個月裏，全國上下刮起了一股「黑風」。在北京，失寵的老紅衛兵公開地向中央文革提出了挑戰，甚至點名批評林彪、江青、陳伯達等文革顯貴。在上海，圍繞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是否應封閉的問題，保守的赤衛隊與造反的工造總司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在其它地方，如廣州、武漢等地，不

·92·
·滿受中共文革支持、驕橫一時的造反派的過激行爲，保守勢力紛紛聚集在一起，發起反攻。不
·至少在人數上，保守勢力仍占有明顯的優勢，例如上海的赤衛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
·發展成一個擁有八十萬成員的大組織。這種嚴峻的形勢，實出乎毛澤東所料。他不得不再次
·調整他的計劃，經他親自修改的《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提出：「一九六七年，將
·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這意
·味着，文革將再度延長，但會在六七年底見分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接見了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這時，他的說法又變了。客人被告知：「現在雙方正在決戰，還未解決，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決問題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出一些時間。」不幸的是，不僅三、四月份沒能看出眉目，整個一九六七年也沒讓毛澤東看出眉目，到處一片亂哄哄。毛號召造反派從走資派手裏奪權，結果造反派為互相爭權撕破了臉，打得一塌糊塗。毛號召解放军支持左派，結果各地的軍人趁機把保守派扶持起來，把造反派打了下去。毛譴責軍方支持錯了對象，造反派觸過身來，把矛頭指向軍隊，幾乎使整個局面失去了控制。好不容易把形勢穩定了一點，但「實現革命大聯合」口號，對一心一意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各派好像是對牛彈琴。到六七年底，中國大陸仍處在半無政府狀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宣布結束文革，對它的發動者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因此，《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一九六八年元旦聯合

發表的社論宣布：文化革命的全面勝利要在新的一年裏才能實現。但這個時限很快證明也不實際。從六八年三月到七月底掀起的「三反一粉碎」高潮使局面再度失去了控制。直至六八年底，動亂還沒有完全平息下去，更不要說完成毛澤東提出的「鬥批改」任務。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估計要取得文革的全面勝利也許要等到下一年的夏天。但半年以後，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又改了口，提出還需要一年時間才能結束運動。

一九七〇年裏，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間的矛盾變得尖銳起來。第二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此後，毛澤東對文革何時才能結束已失去了預測的興趣。一九七五年，他已心力交瘁。此時，他說了一句話：「文化革命已經八年了，現在還是以安定團結為好。」到底文革會是怎樣一種結局，看來他也茫然了。一九七六年，他曾憂心忡忡地說：「看來只有在腥風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後會怎麼樣，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不久，他帶着沒有完成文革的遺恨離開了人間。

一個本來預計只搞三個月的運動結果拖了十年還沒達到其發動者希望達到的目的，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文革的參與者不可能是被動的、無私無欲的機器人；同時也說明了作為一個「超凡領袖」，毛澤東的作用是多麼有限。不管他當初到底希望達到什麼目的，他的悲劇不是他所發動的運動受制於他，而是他受制於他所發動的運動。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

犧牲品。倒是劉少奇有點先見之明，他在運動剛剛發動時就告誡狂熱的學生：「運動有它自身的邏輯。它將遵循自身的邏輯向前發展，而不是遵循你們的或我的意志向前發展。」我們不否認，毛澤東對文革進程的影響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大得多，但他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左右運動的方向。這是因為在文革這場轟轟烈烈的鬧劇中，億萬羣衆也是重要的角色。雖然作為單獨的個人，他們各自的作用微不足道；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對文革進程的影響力是毛澤東個人的影響力所無法比擬的。

自稱「真誠的信徒」並不一定真誠

文革中，幾乎所有的人都自稱是毛澤東的「真誠的信徒」，但為什麼「真誠的信徒」經常不遵循領袖指引的道路呢？

首先，自稱「真誠的信徒」並不一定真誠。有三種人會自稱為毛澤東的「真誠的信徒」。第一種人有發自內心的對毛澤東的愛戴和信仰；第二種人聲稱擁護毛澤東是因為害怕不做這樣的表面文章會受到迫害；最後一種人追隨毛澤東是因為他們認為毛的立場和政策對他們自身有利。很明顯，後兩種人並不是真正的「真誠的信徒」。

其次，並不是所有「真誠的信徒」都積極捲入了文革運動。一般人談到文革，總是講兩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如何如何。實際上，兩大派之外，還有一派——逍遙派。逍遙

派不光指那些什麼組織也不參加的人，也指那些雖然在某個組織裏掛了名，但對該組織的成敗並不真正關心，也不積極參加其活動的人。這是當年用逍遙派這個詞的含意。逍遙派的人數並不少，一般都占當地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變得「逍遙」起來。例如，清華井崗山是全國最著名的紅衛兵組織，武漢新華工是武漢最有影響力的紅衛兵組織，如果翻一下這兩個組織的報紙，馬上就會發現，從一九六七年春天起，在這兩個組織內部，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心灰意懶、傾向「逍遙」了。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清華井崗山只剩下了不到三百個積極的成員。這在有七、八千學生的清華大學，實在是一個極小的數目。在這麼著名的組織裏情況尙且如此，逍遙派在別的單位的比例一定要大得多了。

當然，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在運動初期，還是毛澤東真正的「真誠的信徒」。這又引出了新的問題：為什麼真正的「真誠的信徒」也經常與毛澤東指引的方向背道而馳？為什麼忠於同一個領袖的信徒們會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派別，並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下一節將試圖回答這兩個問題。

研究「領袖——羣衆」關係的九點新議

一個十分簡單但經常被忽視的道理是：領袖的存在必須以羣衆的存在為前提。沒有追隨者的人，無論有多大能耐，也不能視為領袖。個人崇拜必有兩極：偶像及其崇拜者。偶像本身並不創造個人崇拜，只有當偶像受到他人頂禮膜拜時，才會產生個人崇拜現象。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在個人崇拜的兩極中，崇拜者比偶像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承認，個人崇拜是由崇拜者與偶像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則僅僅研究偶像的特徵很難說明個人崇拜這種現象。這樣當然不是為了否認偶像的至關重要性，而是為了強調：忽略了崇拜者的作用及崇拜者與偶像的關係，就難窺個人崇拜之全豹了。

另一個同樣十分簡單但也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偶像是單一的，崇拜者卻可能包含了千差萬別的各色人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崇拜同一個偶像，雖然可以肯定他們的崇拜中有共同的成分，但也必定有不同的東西。據此，還可以推論：崇拜者的人數越多，他們在信仰和行為方面的差別就會越大。假定所有的崇拜者會以同等的熱情、同樣的方式擁戴同一偶像，實際上是在製造神話。

個人崇拜的兩個向度：情感向度與認識向度

個人崇拜可以從兩個向度進行觀察和研究，即情感向度和認識向度（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願為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信息（message）。個人崇拜的這兩方面作用不同。就對崇拜者行為的影響而言，頭一個方面決定了崇拜者與偶像的關係，後一個方面決定了崇拜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及他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雖然，所有的崇拜者對共同的偶像有一種依戀情感，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會依其對偶像發出的信息理解不同而不同，並使其行為方式大相逕庭。在極端情況下，他們之間甚至可能發生嚴重衝突。更重要的是，崇拜者對偶像的崇敬並不能保證他們準確地理解偶像的意圖。因此，甚至崇拜者與偶像之間也會出現潛在的衝突。

偶像是一个信息載體

崇拜者理解偶像的過程就是他們在後者發出的信息中尋找與自己的生活相關的信息的過程。說得稍微過火一點，受人崇拜的偶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傳達的信息。偶像只是一個信息的載體。在另一方面，信息卻不能自詡自明，同一信息對不同的人意思大概很不相同。沒有接受者的參與，信息毫無意義。從這個角度看問題，理解偶像就成了一種解釋它所傳達的信息的活動。

這裏，有三點應引起注意。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對他人都隱形的（invisible）。張三的經驗，李四沒有；反過來，李四的經驗又與張三不同。正是由於存在這種隱

形性 (invisibility) 產生了解釋的必要。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靠解釋來實現的。但是，崇拜者與偶像的溝通與一般人之間的溝通有一個顯著的差別。一般人之間的溝通一般可由面對面的方式，至少是一對一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情況下，雙方可以互相詢問，使對對方的理解不致出現太大的偏差。但在偶像與崇拜者的關係中，不可能是一對一的溝通。這樣，崇拜者沒有辦法得知他們對偶像的理解是否準確。毛澤東是一個更特殊的例子。不像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和希特勒，他很少在公眾場合講話。雖然在文革的頭半年，他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千一百萬進京朝聖的紅衛兵，此後，他便很少作公開露面。大概是為了使人覺得他「神龍不露首尾」，既使偶爾出現一兩次，也只是擺擺手、笑一笑，從不講話。紅衛兵會多次要求他說幾個字，聆聽一下「偉大領袖」的聲音，卻都被周恩來擋了駕。對他鍾愛的紅衛兵小將，他也從無暇與之直接對話。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局勢亂得無法收拾，連神通廣大的中央文革說話也沒人聽時，他才不得不親自出面顯「神威」，召見了譚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受晶、王大鈞「五大學生意領袖」。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紅衛兵面談，談話的結果是他決定解散紅衛兵造反組織。由於毛澤東與他的崇拜者之間存在着這麼大的距離，崇拜者們不可能請他澄清他的每一項指示到底是什麼意思，他本人也不會出面加以澄清。

[◎] 見 James Davie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N.Y., 1963, P. 283.

澄清。詹姆斯·戴維斯 (James Davies) 有句話說得精彩：「熟友眼中無偉人。只有保持距離，才能使人敬畏。」[◎] 但距離的存在增加了解釋的必要。

第一、由於偶像傳遞的信念會在往後的事件中受到檢驗，很明顯，這種信息越明確、越肯定，便越容易被證偽。反之，話說得堂而皇之，但模稜兩可，讓人不知所云，引起崇拜者懷疑的可能性則小得多。古往今來，這類例子太多了。所謂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都是些隻言片語；而且往往不明不白。例如，毛澤東把文革看作一場「階級鬥爭」，但他卻沒有給「階級」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一九五八年，他指出，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可由他的政治態度來決定。這對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大膽的修正。但他從未在理論上發展他的論點。實際上，他對階級的看法是十分混亂的，結果連很多中共高級領導人也不知如何運用他的階級分析方法，更不要說基層幹部和普通羣衆了。又如，「走資派」是官定的文革的打擊對象，但什麼是「走資派」，查遍有關文革的文獻，竟找不到一個定義。一九六七年春，毛澤東在一個場合問包括林彪在內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你們認為為什麼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果沒有一個人回答。毛只好說出自己的看法：「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嘛！」但這只能叫同義反復，絕不是一個定義。「階級」和「走資派」這兩個概念可以說對文革至關重要，它們關係到誰是這場運動的動力，誰是這場運動的對象等大問題。這兩個概念的不清因此引出了對它們的完全不同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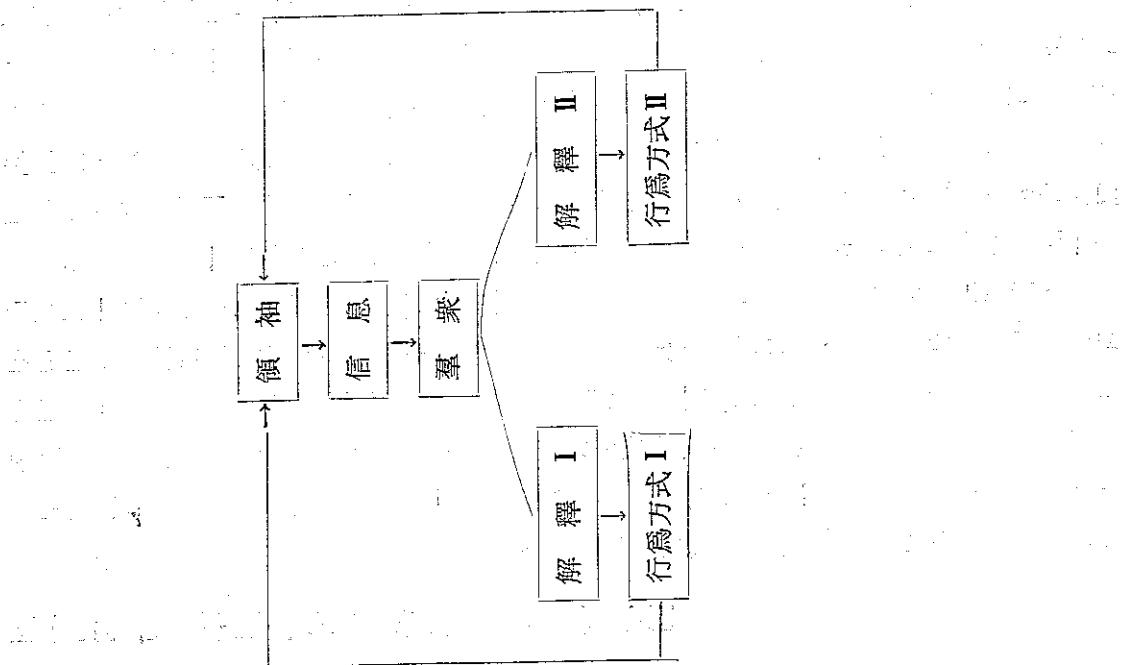
第三，在「偶像——崇拜者」關係中，後者往往是修養不深的平民百姓。對於政治思想史學者來講，如何系統地研究毛澤東思想是一碼事，對一般百姓來講，如何理解「偉大領袖」的指示是另一碼事。思想史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可能比較接近原意，但對歷史事件不會有什麼影響；作為崇拜者的老百姓對毛澤東指示的理解也許十分膚淺，但他們據此而採取的行動可能使歷史改觀。因此，研究文革應注意下里巴人們看似膚淺的解釋。

解釋在只允許官方意識形態存在的環境下，顯得尤其重要。如果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人們可以從衆多的意識形態中選擇對自己最具說服力的一種。但是，如果官方「寵黜百術，獨尊一家」的話，唯一可鑽的空隙就是對官方意識形態作出不同的解釋。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或許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理解是一種建設性的活動。在理解過程中，人們希望發現信息的原意，但常常賦予信息以新意。一旦形成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就脫離原來的信息具有某種獨立性，具有它自己的「生命」，並產生它自己對社會的影響。實際上，在「偶像——崇拜者」關係中，真正影響崇拜者行為的不是偶像發出信息的原意，而是他們自己賦予那些信息的新意。所以以作社會分析的目的出發，研究信息接受者對信息的解釋比研究信息本身更為重要。

我們還可得出另一點結論：「偶像——崇拜者」關係或「領袖——羣衆」關係不是崇拜者或羣衆被動地接受偶像或領袖的信息的單向傳遞過程，而是能動的崇拜者或羣衆對偶像或

領袖發出的信息不斷作出自己的反應，並影響後者未來的信息形成的作用過程。這就解釋了毛澤東為什麼要根據變化的形勢不斷對自己的文革「戰略佈署」作出修改。



同一領袖會在不同人心目中形象 (image) 不同

在不斷解釋領袖發出的信息的過程中，人們會逐漸形成對他的總體印象或形象。也許每個中國人腦子裏毛澤東的形態都不一樣，但正如托洛斯基所說：「即使個性總是獨特的，也不意味着對它無法進行研究。個性中實際上融合了部落的、民族的、階級的、世俗的、制度的因素。只有當這類因素存在時，個性才能表現出來。」^②同樣的道理，一個人對毛澤東的總體印象會受他所處的社會地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說，每一個社會集團都有自己相對一致的對毛的總體印象，而且，不同的社會集團對毛的總體印象也會有所不同。

必須注意，一個客體的形象與客體本身不是一回事。當一群崇拜者自認為是在追隨一個領袖時，他們實際上追隨的是他們自己關於這個領袖的形象。我對文革中羣衆行爲的研究使我相信，人們崇拜的不是毛澤東本人，而是他們自己心目中的毛澤東。而後者是他們揉進了自己的理想、期望、愛憎而製造出來之形象，是他們自己的創造物。雖然，所有人可以引用毛澤東的同一條「語錄」，呼喊同樣的口號，他們所要表達的東西卻往往很不一樣，而且有可能是完全對立的。更重要的是，當現實中的毛澤東發出了與他們心中的毛澤東形象相矛盾

② 見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Michigan, 1960, P. 59.

的指示時，他們就會惶惑不安。如果這種矛盾不斷出現，他們就會修改自己對毛澤東的總體印象，並據此改變自己的行爲方式。

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澤東前往南方巡視。在回京的途中，他發現他所乘坐的專車上的乘務人員分為三個不同的派別。為了說服他們實現「革命大聯合」，毛派隨行的張春橋和楊成武召集三派開會，試圖消除他們之間的矛盾。但乘務員們根本不買張、楊的賬，毛只好自己出面找三派的代表談話，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看在毛的面子上，三派終於答應設法聯合。誰知一出毛的車廂，大家馬上翻了臉，又吵得一塌糊塗。張春橋、楊成武為此大發雷霆，告訴不聽話的乘務員們，毛解決一個省、市的問題，也很少費兩個小時的口舌，現在卻為他們花了兩個多小時。在這種壓力下，火車快到北京時，三派宣布他們「聯合」起來了。可是以後從來未見有人宣傳這個例子，大概車到北京後，這個「聯合」又散了架。這個例子說明，人們心中的毛澤東與現實中的毛澤東不是一回事。毛出面找乘務員談話以前，三派的人都認為自己是忠於毛澤東的，是執行他的「革命路線」的；但當毛本人出現，並苦口婆心地勸他們聯合時，大家都沒有被說服。自認為忠於毛澤東的人都沒有被毛澤東本人說服，這種矛盾現象為什麼會出現呢？只有一個解釋：人們心中的毛澤東比現實中的毛澤東更重要。把這個解釋推而廣之，我們可以說：對崇拜者來說，正是他們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偶像本身，影響着他們的行爲。

權威體系崩潰的影響

• 104 •

雖然同一位領袖人物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形象不同，雖然同樣的信息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如果這位領袖有一整套組織向追隨者提供各種信息的權威解釋，把權威解釋演化為具體決定，並依靠從上到下的機構保證這些決定的執行，則引導羣衆盡量做到思想一致、行為一致並非難事。可在文革期間，除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外，幾乎所有的權威都被打倒了，或嚴重地削弱了。沒有人來告訴羣衆怎麼理解「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指示」，沒有人來指導和監督他們幹什麼、怎麼幹，羣衆必須自己解釋來自北京的指示，自己決定幹什麼、怎麼幹，並自己解決他們之間出現的矛盾，用嘴、用拳頭、用刀槍，所以文革充滿了混亂。權威系統的崩潰，使「偶像——崇拜者」或「領袖——羣衆」關係中的後者作用更為突出。^②

人們的社會地位及他們心中偶像的形成

達倫道夫 (Ralf Dahrendorf) 曾指出：在每個社會組織中，總有些人或集團處在「治人」的位置，另一些人或集團處在「治於人」的位置。前者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後者不得不俯首貼耳，瞧人家眼色辦事。這樣就形成了階層、階級。各階層、階級在享有財富 (Wealth)、權力 (Power) 和威望 (Prestige) 等方面，地位是絕然不同的，同時對事情

的看法也會不太一樣。有既得利益者希望維護和鞏固現存體制，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則認為世道不公，要求改變現狀，由此產生了社會衝突。

當不同社會集團的人崇拜同一個領袖時，他們之間利益的衝突並沒消失。在構成自己心中的領袖形象時，他們會採進各自的期望。這大概是一個潛意識過程。追隨者自以為是領袖的「真誠的信徒」，實際上，他們只是自己心目中的領袖的「真誠的信徒」。在這個意義上，追隨者之為追隨者並不是出於對領袖盲目的崇拜，而是因為他們相信領袖能解決他們各自面臨的問題，雖然，這個領袖其實不是那個外在的人物，而是他們心中的創造物。在意識的層面上，追隨者是非理性的 (consciously irrational)，但在潛意識的層面上，他們是相當理性的 (subconsciously rational)。說得更明白一點，在意識的層面上，他們固然顯得很盲目，但在潛意識的層面上，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就顯現出來了。

由於篇幅所限，我在這裏不可能全面分析文革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政治結構。我只想指出：那時的中國大陸雖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在精英份子與廣大羣衆間橫着一條巨大的鴻溝」^②，但的確存在着靠伯所說的「受惠和受損階層」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② To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67, P. p63.

privileged social strata)。文革使長期掩蓋着的各階層間的潛在衝突一下子爆發了出來。為研究文革，我會採訪了上百名文革的參與者。他們都承認，自己在文革前社會中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文革中參加那一派。直至今日，前保守派仍認為造反派不外四種人：家庭出身不好的、犯過錯誤或受過處分的、調皮搗蛋的、有個人野心的。反過來，前造反派認為保守派大概是三種人：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一貫整人的、對上級逢迎拍馬一心往上爬的和沒有主見、唯上級是從的。很難想像這些文革前背景迥異、文革中互相敵視的人們能崇拜同一個毛澤東。

• 106 •

不同社會集團的人心中的領袖形象不同

既然個人心中的領袖形象裏包含了他自己的期望，不同社會集團對同一領袖有不同的總體印象，因此也就順理成章了。

研究羣衆行為的喬治·魯德 (George Rude) 發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雖然下層革命羣衆支持國民議會裏資產階級政治集團提出的目標和思想，但前者最關心的是能否買到便宜的麵包和其它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後者尋求的是自由貿易和財產權。同樣的口號對不同的人含義不同，所以兩個集團時有衝突。

文革期間，在保守派看來，毛澤東是勞動人民的領袖，是現存體制的象徵；但在造反派



眼裏，毛澤東是他們反抗現存體制的「紅司令」。運動初期，與毛澤東的願望相反，大多數人認為，運動的目的是打退「右派份子」、「反黨份子」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進攻。從六六年四月到八月，報刊雜誌充斥着批刺這些「壞人」的文章。鬥爭的目標上掛吳晗、鄧拓、廖沫沙，下聯本地區、本單位對現狀不滿的人。很多普通的人僅僅因為他們是五類份子，或出身五類份子家庭，或發過幾句牢騷，或穿着打扮不同於眾，而被批制。不少人還被戴上「~~左派~~、真右派」、「反黨份子」、「猖狂份子」、「小三家村」等奇奇怪怪的「帽子」。因此，當八月份公布的《十六條》宣布：不准把鬥爭矛頭對準普遍工人、學生；十月五日中央緊急通知要求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的人平反時，前一段被整的人覺得毛澤東真是他們的「大救星」，~~群衆~~很快地分了派。運動初期的骨幹份子成了保守派，他們的一犧牲品成了造反派。兩派都以為毛澤東站在自己一邊。從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勢力越來越大，保守派們對中央的指示左看右看仍不理解。但他們並不懷疑毛澤東，而是認為有人欺騙毛澤東，才產生了有利於造反派的政策。因此，他們起來反對中央文革。一月奪權失敗後，運動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一月底，在批閱譚震林的一個報告時，毛寫道：如果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變節份子在文革中跳出來，應由革命羣衆認真查明、仔細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這便很多人想起《十六條》中說的：壞人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現在毛本人說要開始打擊壞人了，這不是意味着文革要收尾了嗎？一月二十八日，毛處理。

• 107 •

澤東批准了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這個舉動讓保守派相信，毛澤東要收拾前一段跳出來的「牛鬼蛇神」了。保守派興高采烈，他們認為毛澤東只是玩了一個小小的花招，先引蛇出洞，然後「秋後算賬」，跟一九五七年反右差不多。造反派的日子艱難起來，不少人被送進了監獄，不少造反組織被勒令解散。他們不明白，現在的毛澤東怎麼與前幾個月的毛澤東不太一樣。六七年四月是另一個轉折點，《人民日報》四月一日發表題為《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造反派一下又翻過身來。毛澤東又變得可親可敬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軍主府親」成了一時流傳的名句。三個月後的武漢七二〇事件使全國各地的保守組織紛紛瓦解，保守派的人們又陷入了苦惱：勞動人民的領袖怎麼會拋棄廣大勞動人民呢？直到一年半後，「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時，他們才「醒悟」過來：還是毛澤東站得高、看得遠，他放手讓各種各樣人跳出來表演，然後扎緊口袋，把壞人清理出去。毛澤東仍是勞動人民的領袖。

以上的例子說明，各人心中的領袖形象是依自己的期望塑造的。他們頂禮膜拜的實際上是以票化形式出現的自己。

心中的領袖形象不同導致了不同的行為方式

各人心中的領袖形像不同必然導致不同的行為方式。上面會想到，毛澤東認為文革是一場階級鬥爭，但誰將為打擊的對象卻不清楚。保守派相信，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徹底打

垮文革前的體制，而是為了做局部的改善。因此，絕大多數當權派是好的或較好的，不應打倒，應打倒的只是極少數。而在他們看來，極少數人之為走資派，要麼是被「牛鬼蛇神」腐蝕了，要麼本身就是站進革命隊伍的「牛鬼蛇神」。所以，總的說來，「牛鬼蛇神」應是運動打擊的主要目標。但是，造反派不這麼看。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要徹底改造現在的體制。他們的口號是「十七年歷次運動要重新評價」、「打倒形形色色的衙門，打倒一切官老爺」、「凡是『長』字號的幹部一律靠邊站」。

對文革的目的理解不同，所以各派的策略也不同。保守派傾向於依靠現存的組織結構和通訊渠道。一開始，他們依靠本地的黨組織和政府。當這些機構癱瘓後，他們轉向軍隊。只有通過這些「名正言順」的渠道傳遞的消息，他們才相信。造反派則與現存機構為敵。對地方黨政機關、軍隊說的話根本不信，為此，他們建立了各種各樣的通訊渠道與北京和其它地方聯繫。

雖然兩派崇拜同一個領袖、使用同樣的口號，他們彼此卻很難溝通。處於敵對狀況中，他們都不信任對方、懷疑對方。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偶然事件，也會被解釋為對方有意吃掉自己的大計劃的一部分。為了防備對方的進攻，兩方都積極作輿論和物資上的準備。然後，終有一天，文門變成了武門，武門逐步升級，從拳頭到棍棒，到鐵矛，到槍械，最後在有些地方發展到動用大炮、坦克。在六七年夏天和六八年夏天，武門是如此廣泛、激烈，以致毛

澤東也承認文革已變成了一場內戰。這一切當然都大出毛澤東所料。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廝殺的各方都是他的「信徒」，都聲稱在為捍衛他的「革命路線」而戰。《毛澤東傳》第11章 文革這個例子說明，不論一位領袖人物多麼「偉大」，他所領導的運動並不總是朝着他擬定的方向發展。有些時候，他不僅領導不了運動，反會被運動推得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

應該強調的是，文革的大多數參與者，不論是保守派也好，還是造反派也好，都真誠地相信自己是毛澤東的信徒。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打着毛的旗號謀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在潛意識的層面上，他們的確在為自己的利益奮鬥。通過把期望揉進自己塑造的毛的形象，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一個崇高的事業、為一個代表人民大眾的領袖獻身。在崇尚公益、卑薄私利的中國，這種信念使他們可以不為罪惡感所羈，而放心大膽地與自己的敵手作殊死之鬥爭。這大概也是文革的什麼那麼殘酷的原因之一。

尋求良心上的安慰

時至今日，問到當年為什麼會積極投入文革，大多數人會答道：「上了毛澤東的當」，彷彿他們參加文革是為了毛澤東，而不是為了自己。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但這樣回答的人並不是在有意撒謊，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受了蒙蔽。為什麼他們不能正視事實呢？

一般說來，社會衝突極少直接表現為物質利益的衝突。利益之爭往往披上道德之爭的外衣，諸如誰對誰錯、什麼合理什麼不合理，正義在那一方等。稍稍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社會衝突更就會發現，為了說服別人也為了說服自己，衝突兩方總會盡量為自己的目標、綱領和行為尋找一個說得過去的道德基礎。這時，如果有一種說能夠用來表達自己的願望，他們就會拿過來作武器；如果有人能起象徵作用，賦予正在進行的鬥爭一種意義，他們就會擁戴這個人當領袖。

文革開始時，毛澤東早已奠定了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思想已被奉為一切行為的指南。這樣，衝突的各派別無選擇，為了證明自己一方是正義的，他們必須把自己的組織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聯在一起。當然，他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反對毛澤東就沒有活路，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毛的擁護者，就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毛澤東代表着正義，毛澤東在自己一邊。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在潛意識裏，在實際行動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潛意識的發現是弗洛依德的一大貢獻。他指出：人們真正想要的往往不出現在意識中，出現在意識中的往往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尤其是當人們的願望與大眾接受的道德觀衝突時，情況更是如此。這時，人們就會把這種不那麼「高尚」的願望合理化，使之看上去名正而言順。

在文革的環境下，公開追求私利是說不過去的，因此，人們就會有意無意地把自己意願和行為合理化為對崇高目標的追求，如「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捍衛紅色江山」等。合理化不僅是為了向他人表白，也是為了求得自己心理平衡。合理化使人們自己也以為是在為崇高的目標奮鬥。這就是發生在多數文革參與者身上的情況。如果有人告訴他們，在聽起來堂而皇之的聲明背後，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實際上着眼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會覺得十分冤枉。還是「受了蒙蔽」的說法更能使人接受。

• 112 •

結論

文革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僅僅從單一的角度研究，永遠難窮全豹。總的說來，可以在三個層次上研究這場運動：第一、作為發動者——毛澤東起了什麼作用？做了什麼事？什麼是他的動機？第二、在多大程度上文革前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應為文革的發生負責？第三、羣衆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為什麼？這篇文章着眼的是羣衆的作用，特別是從羣衆的角度看他們與毛澤東的關係。在我看來，「毛澤東在羣衆心目中的形象」(image of mass)是理解文革的一個重要概念。一方面，這種

中現
革表

東澤
毛的形像

前驗
革經
文的

衆
羣

形象把億萬羣衆與毛澤東聯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是由一個文革前的經歷決定的，並反過來會決定他在文革中的表現。

運用這個概念有幾點長處。因為羣衆心目中的毛澤東不同於現實中的毛澤東，我們可以更準確地描述毛澤東與羣衆的相互關係。因為所有文革參與者都自稱是毛澤東的「真誠的信徒」，而實際上各人心中有各人的毛澤東，我們可以更準確地描述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關係。因為「毛澤東的形象」是聯結文革前的經驗與文革中的表現的中介變量(intermediate variable)，我們可以把對文革前社會的分析與對文革本身的研究結合起來。希望這個概念能推進對文革的研究。

桂冠叢刊⑧

李少民主編。許津橋校閱

大陸知識份子論政治、社會、經濟